



# 陈恩焘：北洋海军出身的山大校长

彭均胜

陈恩焘，字幼庸，福州人。出生于咸丰十一年(1861年)，自幼天资聪颖。

光绪元年(1875年)，年仅14岁的陈恩焘考入当时中国海军的最高学府——福州船政学堂，学习军舰驾驶、指挥。毕业后，因表现出色，被李鸿章一眼相中，调北洋水师任职，后成为“定远”号驾驶大副。

光绪十二年(1886年)清政府派出海军第三批留学生，作为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，人数达34人。陈恩焘与刘冠雄、郑汝成、黄鸣球等一起赴英留学，这些人日后均闻名于海军史，可谓人才济济。

1886年11月，陈恩焘被派往英国东非舰队，随“依及利亚”号军舰前往印度洋及斯里兰卡一带实习，历练铁甲舰驾驶、测量、绘图等技术。他们乘英国军舰航行于大洋之上，并学习水道测量学，在英舰实习的陈恩焘，在船由地中海驶入印度洋时，“测出前图未载礁石两处”。在船由新加坡驶往澳大利亚途中，遇到狂风大雹十二次，他用大索缚身桅柱间，“随同船长占针探度，测海驶风，从容量量，不爽毫厘，学习期满甄别时获得上等”。福州船政局的提调道员周懋琦评价说，在英国学习测绘海图、巡船练船兼驾驶铁甲兵船的陈恩焘文武兼备，最为出色。

光绪十四年(1888年)，清政府批准颁行《北洋海军章程》，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化海军——北洋海军正式建军。刚刚回国的陈恩焘受李鸿章亲自提名，被任命为总管全军军械，授游击衔，直属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，负责考核、稽查北洋海军的军械、弹药等事项。

光绪二十年(1894年)，日本借朝鲜问题，挑起了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，北洋海军被历史推到最前台。9月17日，作为舰队司令部成员，陈恩焘随同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乘坐“定远”舰参加了黄海海战，在这场人类史上第一次蒸汽铁甲舰队进行



时任民国海军中将的陈恩焘



1905年山东高等学堂毕业执照

的大规模海战中，陈恩焘作战英勇，受重伤，“仅免于难”，体现了一名中国海军军人的尊严和价值。

尽管中国广大爱国将士浴血卫国，但囿于腐败的政治和落后的战略、战术思想等因素，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。随着马关一纸降书，洋务运动30年的建设结晶——北洋海军，也在刘公岛尽付敌手，全军覆没。作为战争失败的牺牲品，甲午战争后，清政府下令撤销海军衙门，取消北洋海军的编制，所有海军将领一并革职，听候查办。尽管此后陈恩焘又获起用，参与到重振海军的工作中，但因为“目击时艰，痛清室之昏庸”，遂萌生退意，离开海军界。

甲午战争之后，心灰意冷的陈恩焘受政府力请，改往教育界工作。从1902年到1905年，担任刚刚创办不久的山东高等学堂(今山东大学)校长长达三年，在其任职期间，在推进山东高等学堂近代化建设、创设山东首所师范学堂、派遣留学人员等方面做出了贡献。

1903年，《奏定学堂章程》颁布，对照其要求，山东大学急需扩大

办学规模、改善办学条件、重新设置课程，履新山东大学堂总办不久的陈恩焘在山东巡抚周馥大力支持下，励精图治，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改革。1904年，他在杆石桥西路北购地140多亩，修建了2700多平方米的校舍，930多平方米的操场，设有发电所，装有自来水，学校还设有浴室、理发室、天文台。同年冬季，山东大学堂迁入新校舍，正式更名为山东高等学堂。学校从前期筹划、建设到迁入新校仅用了2年多时间，开创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校舍建设先例。陈恩焘还不遗余力地积极争取办学经费，省巡抚答应在藩库税契项下拨款白银8万两，作为常年经费，为山东大学堂持续健康发展夯实了物质基础。

新校和经费有了，陈恩焘开始着手打造办学系统的改革创新。由于当时小学堂、中学堂没有建立起来，这种情况下即使建立起大学堂也没有生源。于是山东大学堂内部分为三个等级，第一等，备斋，相当于县府的小学堂；第二等，正斋，相当于州府的中学堂；第三等，专斋，相当于大学堂。大学堂先从备斋和

正斋入手，暂时不设立专斋。

在陈恩焘校长主导下，1905年，学堂开始招收高等正科，这是严格意义上山东高等教育的肇始。按照新学制的规定，高等正科相当于大学的预科，学制3年。在教师聘用上，陈恩焘也是举贤不避亲，凡是中外优秀人才俱优之。当时，学堂的教师主要来自三部分：教授经学、史学、国文的多是本省有名望的进士、举人；教授数、理、化等科的本国教师多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；学校还聘用美、德、英、日等国的教师教授外文。学校总教习为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登州文会馆第二任监督赫士(W.M.Hays)。学堂学生都是各州县推选而来的廪、增、附、贡生，其中虽有年龄大而思想僵化者，但不乏中文基础相当好的学生。他们的路费、膳宿费均由学堂提供，每人每月还有四两银子的花销。

“欲兴办新式学堂，必先造就新式教师，必先创办师范教育。”1903年10月，陈恩焘顺应时代潮流，争取山东巡抚拨款库银1万两作为开办经费，并将附设于山东大学堂的师范馆分出成立，地址位于济南贡院，改名为山东全省师范学堂，是今山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和全国最早的师范学府之一，也是山东师范教育的开端。学堂第一期招收学生80名，学制三年，称长期班。1904年5月，该班分为长期与速成两班，速成班两年毕业。

经甲午之战，一向被“天朝大国”所鄙视的日本显示了整体国力优势，思想解放的陈恩焘主张借鉴日本复兴之路教育兴国，引进日本的文化与教育制度。师范馆所设图画、地理、算术等课本已经基本与日本学校所用教材内容一致。同年秋，留过洋、见过世面的陈恩焘精心选派50名学生赴日本弘文书院学习，成为山东近代历史上很早的一批留学生，其中徐镜心、张伯言等人在日本参加同盟会，被孙中山先生委任为山东同盟会负责人，并被派回山东发展会员，为辛亥革命在山东的发展蓄积了火种。

山东大学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性大学，其前身是1901年在济南创办的官立山东大学堂。出身北洋海军的陈恩焘成为继唐绍仪、方燕年之后的第三任校长。其实，陈恩焘除了倾心教育事业声名远播外，世人对其求学船政学堂、参加北洋海军、浴血黄海海战等传奇经历却知之甚少，学界同仁也着墨不多。

山东古国系列之三十二

# 有缙国：铁骨谏桀，谜团萦蜀

本报记者 张九龙

有缙国的故事充满了悲壮和传奇。一个赤胆忠心为夏朝社稷着想的老牌方国，最终却以近乎“死谏”的方式，与暴君夏桀拼了个鱼死网破。三千年后，三星堆文明惊艳现世，身上携带着东夷印记，使得这个古国消亡后的去向引起了世界的好奇，至今仍是谜。

## 以小博大 与夏桀同归于尽

有缙氏本是少昊的后裔，长期生活在古大野泽畔，临水而居。夏朝时，朝廷将这片土地划拨给舜的儿子季荝作为封地，于是正式有了有缙国的称谓。有缙国地处当时汶、泗流域通向中原河洛地区的咽喉地带，位置优越，交通便利，且与邻国和睦相处，因此有缙国的社会比较安定，百姓安居乐业。

有缙国究竟有多富足，从它的名字也能窥见一二。“缙”最初指先民的钓鱼绳，这说明有缙氏善于钓鱼。另外，“缙”还是丝的一种，这说明有缙氏懂得养蚕缫丝。这两样技能堪称文明的重要标志。学会了钓鱼、养蚕，就能确保衣食无忧，自然要比其他部落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捕猎山林野物的生活滋润许多。

凭借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，有缙国很快就和近邻有仍国一样，成为稳定夏朝东方局势的核心方国，为少康中兴奠定了基础。可到了夏朝末年，有缙国却成了朝廷眼中的“乱臣贼子”。

夏朝末年，夏桀召集东方诸侯举行有仍之会，想让各国出兵讨伐

商军。夏桀素来暴虐成性，虽然他倒行逆施，早就失去了人心，但一众诸侯因为力量有限，只能听之任之、敢怒不敢言。唯独这个有缙国国君胆量大，居然在大会上公开发难，大倒苦水，并将夏桀臭骂一顿，然后中途退会、扬长而去。

夏桀可是自比太阳的人物，怎会善罢甘休。恼羞成怒的夏桀立刻下令出重兵讨伐这个乱臣贼子。有骨气归有骨气，打仗还是得靠真刀真枪，小小方国再牛，又岂是朝廷的对手。大兵压境，经过几天鏖战，有缙国就抵抗不住了，最终被夏桀剿灭。

俗话说“冲动是魔鬼”，经过这一战，有缙国亡了国，夏桀总算出了口恶气。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，商人借着这个机会继续壮大实力、联络诸侯，最终将夏朝灭亡。如此看来，有缙国的壮烈“牺牲”还是有意义的。

## 缙城堙堆 石器时代现辉煌

有缙国的故城遗址，在今济宁金乡卜集镇的缙城堙堆，位于高庄、邢庄、夏庄、东门屯之间。杨伯峻先生在《春秋左传注》中指出，有缙国故址在“今山东金乡县东北二十五里，旧名缙城阜”。

现存的缙城堙堆是处新石器时代典型遗址，也有龙山文化与周至汉代的遗存，可见早期有缙氏曾经长期在这里活动。遗址长200米，宽150米，面积3万平方米，文物堆积厚约6米，因有缙国及缙城郡在此

建城，长期生活遗存使堙堆高出其他地面，故以“缙城堙堆”而命名。

1981年底，山东省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勘探试掘，相继发现大量文物。遗址上层出土了大量贝币及鼎、鬲、瓮、盆、杯等灰陶器和金属制兵器，属于商、周、战国、汉文化。其次为灰陶和红陶，彩绘采用天然矿物质黑、白、红、蓝等。这些虽是有缙国以后的产物，但从文化的角度来说，显然是存在继承关系的。

下层出土了大量石器、骨器、蚌器，均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器物，更加直观反映出有缙氏先民的生活面貌。石器多为磨制，有加工精制的石刀、石钺、石斧、石凿、石斧、石镰等。骨器有针、锥、镞，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。出土的文物骨骼以猪狗为多，还有马、牛、羊、兔、鹿等动物的骨骼，反映出当时的家畜驯养和狩猎情况。

## 举族外迁 疑与三星堆有关

四川三星堆文化举世闻名，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。作为夏商前后的一个重要文化中心，它的来源始终众说纷纭。有种观点认为，三星堆文化与远在千里之外的有缙国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。

三星堆遗址居民目前有氐羌说、濮人说、巴人说、东夷说、越人说等不同看法，如今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同氐羌说，即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关系密切，三星堆

的主体居民可能是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系。

但是，璀璨的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?学者们却莫衷一是。有的认为其来源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关；有的认为与川东鄂西史前文化有关；有的认为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；有的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。

于是，有学者就考证分析了，有缙氏因为叛夏而遭到朝廷的残酷镇压，即将亡国时，有缙氏的首领迅速动员，号令各族撤离世代居住的地方。先逃亡到河南一带，站稳脚跟后，沿着黄河西进，至岷江时向南拐，进入蜀地。有缙氏先是在岷山暂居，并且把这座山叫岷山，这是因为“岷”和“缙”两个字同音。还把附近的一座山叫蜀山，这是因为有缙氏的一支叫蜀族。后来，有缙氏又向南拐迁徙到成都平原，定居下来，为当地带去了先进的中原文明和东夷文明，包括养蚕缫丝的工艺，奠定了三星堆文化的基础。

这种观点虽然主要是推测，但也有一定的现实依据。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，可以看出明显的太阳崇拜、神鸟崇拜的印记，而这些都是东夷文明的显著特色，这不大可能是单纯的巧合。从时间上看，有缙氏入蜀的可能性确实存在，有缙氏也确实有条件将自己的制作工艺、审美观念、宗教信仰乃至故土情结与当地的土著文明相融合。

有“作案时间”“作案动机”“作案条件”，还能找到蛛丝马迹的线索，也就难怪有缙国被列入三星堆文化的重要“嫌疑人”之一了。